

目 录

我在李宗仁五战区六年·····	庞 堃 文 (1)
老河口战役亲历记·····	何翔迥 (16)
金戈铁马历八年·····	万枚子 (26)
一位“八百壮士”的回忆·····	景 勳 (34)
胡宗铎、陶钧下野前后·····	刘鸣皋 (40)
我的前半辈子·····	刘仁静 (54)
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前前后后·····	晏道刚 (63)
国民党政府南京撤退纪实·····	徐世江 (86)
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杂忆·····	唐特芳 (90)
解放战争中的宜沙战场侧记·····	周上凡 (96)
白崇禧在华中“剿总”·····	李超君 (116)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一局残棋·····	王廷杰 (119)
湖北军界行溃逃四川亲历记·····	季柏龄 (125)
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邴安新 (131)
我在神兵“大道会”里·····	朱继周 (137)
谢冰莹和我的一段婚姻·····	符 号 (144)
宜昌官场的形形色色·····	何 平 (148)
抗战胜利后首航沙市、武汉的回忆·····	刘公武 (154)
追忆参加“国民大会”·····	皮静英 (159)
民国初年的黄安工商业·····	高叔樵 (167)

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	董明藏(175)
我所知道的旧交通银行·····	余茂功(189)
哀欧拿女子中学五十年·····	刘自铮(195)
我所知道的正源中学·····	林美谦(206)
我和大公中学·····	朱贡西(215)
解放前的武汉赌场黑幕·····	胡是依(220)
老河口的乞丐组织·····	郑源川(232)
鸦片在鄂西的泛滥·····	袁简之(238)

我在李宗仁五战区六年

虎 盛 文

1938年广西第五路军军政处处长韦永成调任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时，将我从广西调到五战区。我到樊城后，在樊侯祠见到李宗仁和韦永成，他们命我到长官部军纪督察处任督察官兼密查队长。1939年6月，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成立，我又任调查科长，成了桂系特务。直至1945年调查室活动停止，我在襄樊一带共呆了六年，和当时许多上层人物都有交往，对五战区警备司令部、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宪兵部队均有所了解。下面几段文字是我关于当时情况的一些回忆，倘有遗误，敬请指正。

李宗仁与杂牌军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1938年10月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鄂东移驻樊城樊侯祠。1939年5月8日，在随枣战役中，日军第四骑兵旅团进抵襄阳县双沟镇，长官部与敌仅距60华里，无兵可调，无险可守，乃于5月9日转移于谷城石花镇指挥作战，至6月迁于老河口胡家营。李宗仁从1938年10月率五战区司令部来鄂西北，到1945年元月他调任汉中行营主任为止，在鄂西北长达六年之久。

李宗仁所辖五战区地域辽阔，作战区域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北、黄河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豫鄂皖三省的大部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战区，也是情况最复杂、部队战斗力最低、装备训

练最差、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

部队概况 五战区有支李宗仁不能指挥调动的部队，蒋介石规定驻在五战区的江防军归李宗仁节制，但指挥调动归统帅部。这支队伍多系蒋介石嫡系，人数多，兵源充足，装备优良，计有七十五军周晷部，九十四军李及兰部，第八军郑洞国部，第二军李延年部，第十八军彭善部，第三十二军宋肯堂部及贺光谦师，河防要塞总队，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和王劲哉的一二八师。

机动部队 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拥有十三军陈大庆部、八十五军王仲廉部、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是机而不动，不听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曾请求蒋介石处理，蒋置之不理，李宗仁只好听之任之。

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廖病死于立煌县即现在金寨县后，由李品仙接充），辖有第七军张淦部、四十八军张义纯部，驻守安徽。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后黄琪翔），辖有八十四军覃连芳部，属一七三师钟毅、一七四师张光炜、一八九师凌压西三个师（后莫树杰任军长，钟毅殉国后由栗廷勋接任）。配属的三十九军并非桂系，八十四军于1940年底调去安徽并入二十一集团军。

1941年，在鄂西北的其它杂牌军有：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辖三十军池峰城部、五十五军董福林部、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的（张殉国后由冯治安任总司令）五十九军刘振三部、七十七军冯治安部；及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属之四十一军曾楚元部、四十五军陈鼎勋部，另有石友三残部米文和之六十九军，由第六、第十补训处合併编成之暂编第一师，师长王仁曲（后李才桂），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曹文彬、三纵队司令曾宪成、六纵队司令曹勤、九纵队司令李朗星部，多由地方团队编成。

以上部队，西北军战斗力较强，张自忠殉国，孙连仲又被六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邀去充任代理司令长官，并带去他的三十军池峰城部队。1941年李宗仁能指挥依靠作战的部队几乎清一色的是杂牌军（除暂一师）。这些杂牌军中还杂中有杂，如二十二集团军孙震原系川北田颂尧的一二四师师长；一二二师王致远原系西北军，驻于汉中，阎、冯倒蒋失败后，投入川北的。四十五军陈鼎勋是邓锡侯的部队，陈鼎勋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同为师长，邓锡侯回四川后，陈鼎勋才充任军长的。虽同为川军，混战时打过派仗，四十五军喊邓锡侯叫老板，一切听命于邓锡侯而不听命于孙震。桂系里李品仙是唐生智旧部，亲信多系湖南人，在安徽，湖南派与广西派是经常火并的。另外还有元老派与少壮派之争。三十三集团军虽然都是宋哲元旧部，论资排辈之争也是激烈的，五十九军军长原为黄维纲，那个曾在冯玉祥身边多年的刘振三就不听命，挤黄维纲下台，取而代之。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能指挥的仅有三十军池峰城部，刘汝明、曹福林是韩复榘部下，并结为儿女亲家，两人休戚与共，所部人事任命，孙连仲无权过问。

兼收并蓄，休戚与共 李宗仁倍感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手反共、一手消灭杂牌军的策略咄咄逼人。他常讲：“我抗战后，弃甲归田，去当百姓。”这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们经常是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各怀心机。李自有他的老主意，那就是对蒋介石排斥的杂牌军兼收并蓄，休戚与共，以此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实力。蒋介石为了“绥靖”四川，想千方设百计将川军调出。于是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往山西，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阎锡山是闭关自守的土皇帝，对外调军队本存戒心。二十二集团军调山西后，因补给困难，劫了阎锡山的弹药库。阎锡山就报告蒋介石说二十二集团军无战斗力，军纪败坏，要逐出山西。二十二集团军回四川已不可能，蒋商请一战区程潜将其调一战区，被程拒绝，李宗仁接白崇禧通知后，表示欢迎。二十二集团军始得有安身之地，得以逃脱即将被编遣的危机，因而

士气陡增。所部一二二师王铭章师长奉李宗仁命保卫山东滕县时，王与城共存亡，壮烈殉国，为台儿庄战役立下了不朽功绩。川军本来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舆论，而这一次战役既使他们雪耻，也给他们树立了威信。邓锡侯载誉回川后，李宗仁力主保孙震为总司令，陈鼎勋为副司令，这就皆大欢喜了。

刘汝明、曹福林系韩复榘旧部，韩复榘被枪毙后，由孙桐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在郑州归为一战区，被戴笠害得撤职查办。他们到五战区后，李宗仁将其编入西北军张自忠或孙连仲战斗序列，先任命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继升总司令，再升为副司令长官。刘汝明扪心自问，与孙桐萱命运相比，当然是对李宗仁无比感激了。

李宗仁及其杂牌军，在鄂西北可称是泪眼对泪眼，断肠人又逢断肠人。长期以来，他们得不到公平对待，兵源无法补充，弹药得不到补给，军费也受到克扣，蒋介石还要经常调整及裁编其部队，不断削弱其兵力。这种共同遭遇，使大家产生了共同语言，进而休戚与共。当时有个共同的想法：蒋介石藉抗日使杂牌军自生自灭；我们要有钱，就有人，有人有枪就有钱，有钱就有官。在那个时候，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同时在休戚与共中，大家也更以李宗仁为靠山。这是蒋介石帮了李宗仁的忙，把五战区杂牌军紧密团结在李宗仁周围了。

李宗仁身边有个黄建平，虽生于广西，但在保定军校一期毕业后就投靠于西北军冯玉祥，曾任过参谋处长，后到北平充任宋哲元的幕僚，当过北平社会局长。他和西北军将领都有深厚的渊源，蒋桂混战时，就给李宗仁在华北当说客。他到鄂北后任中将军法执行监，仍然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奔走于西北军驻地。他不论是在樊城或老河口，都居住在幽静的乡村。他的住所成了替李宗仁招待西北军将领的宾馆，并投其所好，准备了鸦片烟和赌具，使西北军来客宾至如归，在谈心交心中为李宗仁做团结工作。

黄还邀请了在张自忠当西北军校校长时的教育长张寿龄做助手，又力保张寿龄充任李宗仁办公室专任高参。黄和刘汝明、曹福林的关系很深，他既是李宗仁的使者，也是西北军的代言人。黄消除了桂系和西北军人物的隔阂，使他们变成了同路人。1941年底，汤恩伯要吃掉一战区米文和之六十九军（石友三的残部），逼得米文和派密使向黄建平求计。黄引见给李宗仁，并力主收容，从而使米文和率军冒受追击的风险到了新野。斯时黄建平代表李宗仁在新野迎候。该县县长晁庆冒（原是五战区长官部秘书）还无条件地给米文和部发了充足的粮秣。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编制（实只一部兵力），这些都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

李宗仁对收抚杂牌军是费尽心血的，他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实际上对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给钱任用。长官部有很多挂名的参议、高参，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都是说客，都是使者，如刘汉川对徐海，乔立志（原韩复榘手枪团长）对韩旧部，季雨霖对鄂北地主武装，以及对豫南及别延芳；邓介人对王瓚绪，陈江对进步人士等，都各有任务，是为团结各方面力量而做工作的。

苦心经营干训，建立联络渠道 李宗仁经常感到干部缺乏，早在1938年就办过潢川青年军团来扩大影响。蒋介石看准了他这一着，将其收归所有，改为战干二团。李宗仁无可奈何，到鄂西北后，他又建立了五战区干训团，蒋介石又将其改成中央军校八分校。1941年，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办高级干部作战训练班。李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训练班上，天天上午到作战班和同学们一起听课，有时还共进午餐，与大家进行个别交谈；处处表现他关心部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毕业时，李还给每人发了自己的像片以志纪念。从此，他对这批军队调训的干部就特别亲近。这些人有时来会他，他随时接见，问寒问暖，推心置腹地交谈，李就这样争取到不少中级干部对他的好感和信赖。

李宗仁对杂牌军拉拢的另一个手法就是拉进来。长官部参谋处处长高松元原是孙连仲的亲信高参,李宗仁表扬高能干,后向孙连仲讲,请高松元来任参谋处长,这样就一举两得,使孙连仲感到在长官部有他的亲信而欢心。李宗仁对一、二、三、六、九纵队,仅相信一纵队曹文彬和六纵队曹勛。在合适的情况下,他派了尚琪翔(作战参谋)去充任了副司令,这就使曹勛得到了联系方便,李宗仁也有了代理人;对曹文彬派了政治部主任林勋,派黄敬修为王瓚绪部参谋长。

李宗仁在鄂西北时,对如何团结杂牌军队确实下了功夫。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也得到了收获,扩大了声望和势力。在他将去汉中时,为了巩固他的势力,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到各处一一告别,并带着黄雪邨、尹冰彦到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李宗仁带着微笑与其谈心。李回到老河口后,在一片欢送声中去了汉中,他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及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这也就看出了李宗仁的高明。

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炎黄子孙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部队一律听从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此时,蒋介石提出加强军法执行机构,成立了军法总监部,并调曾任湖北省主席的柯成濬任军法执行总监,在各战区设立军法执行监部。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就是这时成立的。

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在樊城时设于晏公庙前;在老河口设于楸树坟,主要成员有督察官张寿龄、王忠山等,上校军法官张俊杰,此人年逾花甲,因他玉成过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婚事,成为军法执行监的特殊人物,他什么都问,却又什么都不干。另有军法官万

剑民、王家麟、蒋玉伯，书记官任礼庭及副官、军需多人，并由总监部派宪兵一班担任警卫。

军法执行监部内设有禁闭室，但仅供临时关押犯人，长期关押的案犯都押在五战区长官部宪兵营一室（朝圣门关帝庙内），迁老河口后，押于长官部特务团内。军法执行监部不受理政治案件。

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人事经费由军法执行总监部负责，但直属长官司令部指挥。因此，历任军法执行监都是由李宗仁保荐任命的。第一任军法执行监是桂系军队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任民（中将），张任职时间不长，1938年春调往河南潢川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任副团长后，由中将高参黄建平继任。黄在西北军多年，与五战区将领张自忠、冯治安、孙连仲、池峰城、李文田、刘汝明、曹福林、米文和、庞炳勋等多人都是老朋友、老同事，为李宗仁四处奔走联络，作了大量的工作。因他常招待这些部队高级幕僚和东使，为保密起见，在樊城、老河口都远住在偏僻农村，很少到执行监部，执行监部一切事务多交给他的老朋友、长官部高级参谋、军法执行监察官张寿龄负责。黄建平在桂系中是坚决反蒋人物，所以他拒绝交往一切中央嫡系人物，因此，多次受到军统分子的迫害。军风纪视察团少将军法官钱协民和黄意见不和，双方斗争激烈，钱曾阴谋策划借黄建平吸鸦片一事掀黄下台，但未得逞。

1939年冬，黄建平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军统上海区特务头子周伟龙策动汉奸出卖而遭破坏。黄愤而请求辞职，拟亲往上海恢复，未蒙李宗仁批准，后派长官部副官处第一科科长傅少伟前往，继又派督察官王忠山去上海。1941年黄建平离开军法执行监部，仍任中高级参谋，与西北军将领来往频繁，座上客常满，开支庞大，入不敷出。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各送他大卡车一部，改装为客车，由他转亲信书记官任礼庭经

营。1945年，李宗仁调陕西汉中行营主任，黄留居黄龙滩，抗战胜利后才去了天津。

为整顿军风纪，1938年冬，五战区长官部迁到襄樊后，李宗仁命令成立军纪督察处，黄建平兼任处长，另调长官部参议刘仲华、罗象贤（兼襄阳县县长）、尹治（后任政治部副主任）、高级参谋陈序、王家本等为督察官。派王家本到老河口成立光谷军警督察处，调政治部组员庞郁生任督察官兼密查队队长，并从五战区政治部隆中训练班选调30人为密查员。这些人经短期训练后，由李宗仁签署发给密查工作证，派往鄂西北各地工作。其它成员由军法执行监人员兼任，两个机构，一套人马，实际上还是一个。督察处另调八十四军一七四师苏武扬团为督察团，分驻樊城城郊担任警卫任务。督警处的日常工作，系由黄建平委派的督察官刘仲华负责。刘仲华当时住在密查队对面，李宗仁经常夜晚到该处工作，情况由刘仲华向李宗仁汇报。

军法执行监在樊城时，曾办了不少案子，如枪毙长官部通信军官×××一案。此人奉命到枣阳给十一集团军送军事作战方案，到张湾后宿娼，贻误军机，军法执行监部将其逮捕审理后，判处死刑。原军委会高参兼徐州要塞组长刘群，在台儿庄战役时，携款潜逃到宜昌经商，军法执行监部奉李宗仁的命令，将其从宜昌押回襄樊，经军法官万剑民审讯后，枪毙于朝圣门外。

1939年5月，长官部迁到谷城县石花街，军法执行监也随迁，负责长官部警卫工作，年底始迁于老河口，设机关于鞞树坟附近。在这期间，曾扣押光谷警备司令王家本。王家本系陆大毕业，是参谋长徐祖贻在陆大任教时的爱徒，到五战区后曾任参谋处副处长、督察处督察官、高级参谋等职务，王是风流人物，放荡不羁。到老河口充任光谷警备司令后，长期宿于老河口名妓崔国庆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吸毒、赌博无所不能。因其胞弟王家麟是军法官，又有参谋长徐祖贻庇护，故平日专横跋扈，鱼肉

百姓。李宗仁到老河口后即令扣留，原拟处极刑，终因徐祖贻多次求情而释放，解放前夕仍任“华中剿总”中将高参。由此可见，军法执行监部也是官官相护的。

黄建平离职后，由程潜介绍湖南人唐星接任军法执行监。唐星在抗日前任程潜的代表住广西，与桂系有一些联系，但关系不深。唐曾留学日本，兼任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监督，是汤恩伯的老上司。他在老河口时，表面唯李宗仁之命是从，实际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戴笠派军统特务到五战区成立调查室，遭到李宗仁的拒绝，唐便让军统在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成立军统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主任由周兆祺充任。这样，五战区就有了两个调查室，唐星在五战区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的角色。

唐星去后，又由李宗仁保荐他的表弟黄敬修充任军法执行监，一直到抗战胜利。

襄樊警备司令部

1938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移到襄樊时，襄樊警备司令部已经设立，司令是东北有名的人物冯庸。冯庸是陈诚的红人，和桂系格格不入，在五战区工作自然不顺利，不久便离职去六战区。冯去后，警备司令由襄阳地区专员吴良琛兼任，保安副司令吴扬善任参谋长。吴扬善还兼管防空指挥部，所以防空指挥部的军法官、副官等多由保安司令部的人员兼任。保安司令部还设有稽查处，梅兰波担任处长，负责纠查军风纪及侦缉。

1939年5月随枣会战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军统湖北站江北分站站长肖慧佛、襄樊组组长冯子固趁机向吴良琛介绍洪帮鹿门山头大爷吴晴川充任襄樊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位曾任过襄阳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体育教员的复兴社成员，便依靠军统支持在樊城前街黄州会馆设立了稽查处。吴晴川任稽查处处长后，聚集了一群乌合之众，洪帮么爷刘启浩、梁占奎，三爷孙霞轩也

都脱下马褂，换上了军装，摇身一变成了稽查，襄阳泥咀镇王宾（又名王雅卿）充任了稽查队长，小偷头目朱安清（又名朱六）也成了便衣侦缉人员。

吴晴川在乡师时就已开堂收弟兄，其中有襄北恶霸姜南图，襄南恶霸庄国本、王承韬等都是在读书时加入了洪帮。在吴晴川当稽查处长时，有许多商店小老板为谋求护身符，躲避壮丁，无业游民，二流子，想依附混口饭吃；兵痞、伪杂们想找靠山，以招摇撞骗；个别士绅们想捞个心腹大爷图个体面，都纷纷投到吴的名下。一时间，吴晴川名声大噪，不可一世，稽查处变成了吴大爷的堂口。烟、匪、霸、娼连在一起，依靠吴的势力，为非作歹。老百姓说：“稽查满街走，偷盗是朋友”。吴晴川一伙成了襄樊的一害。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时，吴良琛调宜昌专区，李石樵调任襄阳专区行政专员，并兼任襄樊警备司令。襄阳地区保安司令吴扬善兼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稽查处长换上了鄂北公路段司机长周坤山。此人是靠耍汉流（洪帮）通匪起家的，甚好聚赌宿娼。他虽然目不识丁，但颇善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巧于钻营，靠走李专员的内线林姓太太的后门而佩上了上校领章，当上了稽查处长。周上任后，肆意为虐，横行乡里，包庇烟赌，霸占民房，把强占余凌宵遗孀胡真仪的独院厅房，布置得富丽堂皇，专门用来和李专员的爱妾林氏打麻将。周坤山娶有四房太太，她们在周坤山的授意下，都各尽所能侍奉林夫人，极力投其所好，使林夫人乐不思蜀，经常通宵达旦在周公馆打麻将。周坤山又选派名伶教林夫人的少爷小姐唱京剧，人称周公馆是“牌声响亮，歌声绕梁”。周坤山靠阿谀奉承成了李专员的红人。

1940年秋，李宗仁到樊城集集检阅广西嫡系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住在栗师长处。因为李石樵曾在桂系朗、陶部任过师长，是李宗仁的旧属。一次，李宗仁去襄阳专署赴李石樵宴会，同行

者有我和机要秘书黄雪邨。这时李朗星已任保安副司令兼襄阳县长。李朗星命令他的保四团一营康克明部，从朝圣门起遍布警戒岗哨。车到襄江边时，更是岗哨林立。李宗仁很生气，在车中说，这是谁干的？妈的！又不是枪毙我。周坤山适时正在车门迎候，他毫无军事常识，连敬礼也不会，手足无措，弯腰打躬，张口结舌，丑态百出。李宗仁气上加气，面有愠色地问我：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我说是稽查处周处长。李又说，岗哨是他布置的吗？快撤！快撤！弄得这位肥头大耳、身若门神的周处长面红耳赤，十分尴尬。驱车途中，我如实地向李宗仁报告了周的情况。李宗仁说，你告诉李石樵，只要孩子不要娘，免得出丑。我默不作答。李又说：你怕什么？就说是我说的。后来我只得婉转地告诉李石樵，李石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撤掉了周坤山。周被撤职之后，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乘机推荐刘东森担任稽查处长，并调特训班毕业的正牌特务李永银任督察，负责侦缉工作。自此，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军统所控制。

刘东森是湖北房县人，是军统派驻襄樊的特务，他虽在襄樊从事特务工作多年，但一直以樊城商会小职员作掩护，没有暴露身份。当上处长后，身份公开了，于是千方百计地树立自己的威信。襄河南岸王家集有个联保主任张学忠，是个坐地分赃的土皇帝，当地其它派系对他十分不满，彼此争权图霸。刘东森受另一派的怂恿，便想借机显露一手，随即带着十几个便衣，夜晚去抓张学忠。张学忠在家聚赌，茫然不知。围至拂晓，破门而入，张学忠束手就擒。在回归途中，张的党羽大有劫人之势。刘东森当机立断，立即将张学忠击毙。此事发生后，李石樵深感军统人员难以控制，自己无能为力，乃拉拢李朗星，让其充任保安副司令，将原副司令吴扬善调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为安抚吴心，李又保吴扬善代理警备司令，吴升任后，司令部迁至樊城天主堂内。

吴扬善虽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却是个好好先生，干不成

事，不久便辞职了。徐会之调任襄阳行政专员后，由徐兼任警备司令，稽查处长由他的亲信、战区政治部中校视察员詹友梅充任，詹是军校学生，和当时襄阳县府、宪兵营、二十二集团军执法队、保安四团等单位都能和平相处。但当时襄樊两城治安仍然很乱，夜晚城内防匪防盗，城外依然有人杀人越货。徐会之既当专员，又兼任湖北省鄂北行署主任，无法兼顾地方治安，便推荐了军令部少将联络高参潘祖信任警备司令，司令部迁到武昌馆。大半年后，潘也不愿继续干这个空头司令了，随即辞职，后由二十二集团军少将高参杨佑民接任警备司令。

司令部的活动主要在于稽查处，稽查处长詹友梅因经徐会之推荐去荆门县任县长，稽查处遂改为稽查队。队长换了几个，但总离不开地头蛇王宾、朱安清、梁占奎等人。原因很明白，这些人和烟、匪、霸、娼息息相关，能为警备司令部招财进宝，也能应付混乱局面，所以，那时警察与小偷是水养鱼，鱼帮水，遭殃的是老百姓。

1945年3月，日军侵犯襄阳时，警备司令部被撤销，抗战胜利后，警备司令部又于1946年恢复，司令由石朴天兼任，司令部设在樊城武昌馆内。

五战区的宪兵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各战区都由蒋介石派遣宪兵部队，这支特种部队是蒋介石的武装特务组织、执法队，是蒋家王朝的御用工具。

1938年初，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随身带着由他组建的所谓八桂子弟兵——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宪兵团第一营，担任司令长官部警卫，以示拒绝蒋介石派遣宪兵到五战区。广西宪兵第一营是五战区最早的宪兵部队，该营辖四个连，营长廖祖燕，连长有秦禹、温胜华等人。直接担任李宗仁警卫工作的是秦

禹连，该连是经过严格审查选拔的，一兵一卒都是广西人。宪兵二、三、四连散驻在司令长官部附近，担任五战区所属单位的警卫任务。这几个连虽不直接担任李宗仁的警卫，但也要符合兵是广西子弟兵、官是广西军校生的条件。宪兵部队来樊城后，驻在迎旭门关帝庙内，并在此设禁闭室关押人犯。

李宗仁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宪兵部队，蒋并没让步，早在五战区刚成立时，他就命令宪兵司令部派遣宪兵特高组到五战区。特高组长谢朝征，湖南华容人，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身材高大，长于擒拿，干过多年的行动工作。他自己常吹嘘说，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的警卫队长，护送过老班禅活佛入藏。他初到五战区时，行动诡密，先是隐藏在国防要塞组组长李星五那里，后来又和《中央日报》记者张元尘住在一起。特高组没有专用电台，和宪兵司令部联系，是通过中央特派员范世勤的电台进行的。

特高组在五战区除自己活动外，还布置了外围组织和情报网。随枣襄宜一带由充任过宪兵连长的江西人雷云鹏负责。此人长期住在樊城一家染房内，和当时中统特务负责人孙守番、三青团骨干胡兆和、叶自成、任步祺过往至密。1939年雷曾破坏过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南漳开设的军民大饭店。老河口组长是邓涛（安徽人），他和军统特务王忠三一起潜入到光化各抗日组织，并策动王忠三的妹妹窃取了光化县妇女会会长的职务。邓涛因在五战区成绩显著，后擢升为四川万县特高组长。均、郢一带特高组由冯季善充任组长。冯毕业于徐州高中，有文化，他在郢阳联中以谈恋爱的方式和学生拉关系，搞情报，对破坏联中地下革命组织起了主要作用。

特高组人员在五战区还和青洪帮勾结在一起，冯季善、雷云鹏都曾拜青帮头子常圣熙作师傅。特高组还从四川调来一批学生，先予以特工训练，然后混入政工队和进步团体，对鄂西北一带地

下党进行破坏活动。鄂西北中共党组织在谷城茨河办过工厂和训练班，特高组就派刘健混入工厂从事破坏活动，使工厂遭受很大的损失。五战区宪兵特高组的成员都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象雷起鹏、刘健、邓涛、冯季善等都是在宪兵学校受训时的骨干，很善于伪装自己，隐藏到群众中搞情报，使鄂北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9年秋，蒋介石下令统一全国宪兵机构，派宪兵司令部特务、警务处少将处长韦持平到五战区接收广西宪兵营，扩充建立宪兵第十七团。李宗仁对蒋的用心十分清楚，心中不满，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不得不服从蒋的指挥，便采取“敷衍”的办法，将宪兵营少数老弱士兵移交给韦，而将骨干分子留下。重新成立长官部特务团，团长由参谋处的科长霍冠南充任。

韦持平是贵州人，中央军校毕业，和当时任宪兵司令的谷正伦是亲戚。他来五战区时持有他表兄五路军军务处长陆树轸的介绍信，想以此结交桂系上层。他还经常大摆宴席，笼络人心，以图建立关系。但桂系人物心中有数，对他敬而远之，使他处处遭到冷遇。韦见自己在五战区无法开展工作，便去重庆另谋班底。

1940年夏，宪兵第十七团在老河口正式成立。团长韦持平，警务团团附吴昌侯。十七团下辖二个营，第一营建立了樊城宪兵队，营长王介艇（安徽人），黄埔八期学生。王任第一营营长之后，驻防樊城，纠察区乡工作。1941年王调任宪兵十七团中校副团长，原在谷城黄家堰训练宪兵新兵的郑一民调樊城担任营长。郑是广西人，曾任过多年宪兵警务处情报编审，因此，搞宪兵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颇有经验。二营营长由警务团团附吴昌侯兼任。

除了宪兵部队外，当时在五战区还驻有二十二集团军执法大队、襄樊警备司令部稽察处，保四团、樊城警察局等，使樊城军警林立，宪兵、警察到处可见。不仅如此，宪兵队还吸收了不少地

痞、二流子作外围，专门配合雷云鹏负责的宪兵特高组活动。特高组也在樊城市郊的各集镇设置外围组织，把樊城搞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然而，由于军、警、宪各属一个系统管理，常常发生冲突，故宪兵十七团在襄樊并不能顺利开展工作。一次，宪兵在樊城扣留了贩运鸦片的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的亲戚、集团军兵站高库长，惹翻了二十二集团军的主要头子，军宪双方发生冲突，几乎动武，闹起了很大一场风波。后来，副官处长肖峻和侍从室主任曾延鹏约我去调解，释放了高库长方算了事。但是，自此以后，二十二集团军执法大队以县官不如县管的优势处处压制宪兵队，使宪兵队无法开展活动。老河口宪兵队和长官部特务团也是一个槽上拴的两头叫驴，双方矛盾重重，互争雄长，冲突时起，常有宪兵失踪和被投入襄河的传闻。

1941年，韦持平调宪兵司令部任警务处长，另调警务处长刘家康来五战区接任团长。刘家康是河南人，中央军校宪警班毕业生，此人身材矮小，长得像个白面书生，看起来温文尔雅，但他确是个特务老手，曾任宪兵一团团长蒋孝先的警务团附。这个团在北平、西安等地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杀害过爱国志士，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也因成绩卓著而擢升为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刘来到老河口后，装得道貌岸然，一副学者的样子，还编了一本关于伦理的小册子，宣扬蒋介石倡导的“四维”、“八德”，和当时青训团副主任吴双鞠、五战区调查室主任冯树等人打得火热。1945年元月，五战区特务团随李宗仁去汉中，五战区司令长官换了刘峙，这位几年来满口道德纲常的伪君子便凶相毕露，在豫南、郑州、洛阳等地大肆搜捕革命人士，镇压革命运动，此时五战区宪兵团已完全被蒋介石控制，成了蒋家王朝的得力鹰犬。

(襄樊市政协供稿)